

江南文化研究专稿

引文格式: 吕杨. 制造刘伯温: 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 (3): 78-97.

制造刘伯温: 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吕杨

摘要: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民众心目中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 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事实上, 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之一, 在世时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 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 且具备天文知识, 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陪衬人选。基于此原因, 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 受三国文化影响, 又融入了大量三国文化元素。此类历史书写模式, 虽然使刘基迅速登上神坛, 并为民众所接受, 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 经浙籍官员推波助澜, 被官方有意制造的刘伯温形象通过小说、话本、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传播, 使刘基历史地位陡升, 但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却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 民间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 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

关键词: 刘基; 朱元璋; 《史记》; 《三国演义》; 浙籍官员

作者简介: 吕杨, 历史学博士, 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中国史学科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明江南社会治安研究”(15BZS061)。

中图分类号: K827; K248; G206; I20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3.009

刘基字伯温, 浙江青田人, 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明代开国功臣, 朱元璋创业时期重要谋士之一, 洪武三年(1370)被封爵诚意伯。提起明代文学家刘基, 知晓者寥寥无几; 若提起明代开国功臣刘伯温, 则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人们的心目中, 刘伯温不仅文武双全, 而且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博古通今, 甚至还能预测未来, 民间盛传预测未来的《烧饼歌》即托名为刘伯温所作。故民间有“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统江山刘伯温”之说。然而, 民众心中的刘伯温形象并不真实, 是史家在历史书写中刻意与传说、民间故事相结合, 着力夸大和构建的产物。本文撰写目的旨在试图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 解构民间意象中的刘伯温, 为读者再现历史中相对真实的刘基。

一、问题的缘起与相关研究述评

笔者曾于2007年对中国大陆文史领域的刘基研究现状进行过述评^[1], 通过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 史学界对刘基的评价赞誉居多。在众多溢美之词中, 只有陈学霖、杨讷两位先生不囿于成说。陈学霖认为, 刘基“才学渊博而宦途坎坷, 在明朝开国的不寻常背景里, 最易滋生谣

言将其逐渐神化”^[2]。《英烈传》又将刘基打造成诸葛亮形象，使刘基传说“愈变愈离奇怪诞，到了清中叶，又被排满的秘密会社假托附会，变得更加神奇玄秘”^[2]，各类层出不穷的反清谶语将刘基塑造为先知先觉、预言推翻清朝统治的神秘民族英雄^[2]。杨讷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刘基并没有民众口中那么神奇，在明太祖心中，刘基不过是一个术士形象而已^{[3]103}。

2007年至今，历史学界对于刘基的研究依然热度不减，成果众多。温州地方政府亦助推刘基研究，多次召开以刘基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学术界对刘基及明初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十几年来，虽然海内外学者对刘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但相关研究似并未趋于理性，对于刘基的评价仍是一边倒的赞誉，对成说质疑者依旧寥寥。就笔者目之所及，竹下直指刘基与张良、诸葛亮一样，都是被神化了的人物。“刘伯温又懂得那个时代极少有人懂得的天文学，于是，被神化了的刘伯温以精于象纬之学名世。”^[4]陈学霖在其论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的第五篇《刘伯温与“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考溯》、第六篇《台湾流传的刘伯温预言传说探溯——〈烧饼歌〉、〈刘伯温谶〉、〈救劫碑文〉及其他》中，对刘基人物形象建构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刘伯温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来历不明，大概到清末始从坊间以口传民谣流出，作为不同地区对集体历史记忆的折射，由民间文艺家记录下来”^{[5]147}。“到清中叶后，由于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和革命分子的煽动宣传，刘伯温被进一步神化为逆知未来的大预言家”^{[5]149}，“把刘伯温的神化推至极高峰”^{[5]171}。对于台湾地区流传的托名刘基所作《烧饼歌》等谶语、谣言的源流等问题，陈学霖做出以下解读：晚清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在大陆作为反抗民族压迫宣传品的《烧饼歌》等在台湾广泛传播，号召民众反抗日本侵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迁台的军民又将大陆地区相关文本、民谣带入台湾；“中国大陆和台湾民间社会的持续性仍相当顽强，而这恰恰是刘伯温信仰研究最困难又深具魅力的地方”^{[5]205}。王赫在对杨讷专著《刘基事迹考述》的书评中，称杨著“打破刘伯温事迹的神话”，认为刘基事迹“流传于社会各阶层，并在民间不断‘层累地’敷饰下，渐被神化”^[6]。他赞同杨讷的观点，亦认为刘基并非死于胡惟庸之手，而是“在罢官归田后，带着官场失意，在忧闷抑郁中去世的”^[6]。

众多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刘基的各类事功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特别是陈学霖、杨讷通过理性的分析，为我们剥去刘基身上的重重“光环”，使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刘基。由于史料等因素限制，陈、杨等先生的研究仍有个别未尽之处，需要后学补充、深化。故笔者不揣浅陋，对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等问题再做探讨，略抒管见，抛砖引玉，以期加深对刘基及相关文化现象的研究。

二、明初刘基传记对《史记》的模仿和对三国文化的接受

明清史书对刘基事功记述众多，明代刘基传记史料主要有《诚意伯文集》中所载黄伯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下文简称《行状》）、《明太祖实录·刘基传》、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刘基传》、黄训《名臣经济录·刘基行状录》、雷礼《国朝列卿纪·刘基行实》、万表《皇明名臣言行录·刘基传》、何乔远《名山藏·刘基传》、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刘基传》、唐鹤征《皇明辅世编·刘基传》、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刘基传》、张岱《石匱书·刘文成世家》等。清代刘基传记史料主要是官修《明史·刘基传》、万斯同《明史·刘基传》、傅维麟《明书·刘基传》、查继佐《罪惟录·刘基传》等。

明清诸多的刘基传记存在严重的相互抄袭、引用无出处等弊端，若究其史源一般源自黄伯生所撰《行状》和《明太祖实录·刘基传》。杨讷经翔实考证后，认为《行状》夸大其词，系建文

时期刘氏族人伪造,“不仅是叙事不实,连他署下的作者姓名(黄伯生)与撰写时间(洪武十六年)也是不可信的”^{[3]169}。“推想署名黄伯生撰的《行状》应是刘璟、刘廌等所为。”^{[3]178}明清刘基传记中所涉刘基事功主要体现在习天书兵法、辅佐石抹宜孙、入金陵辅佐朱元璋平灭北汉、明朝建国初期业绩等四个方面。各类史料在记述刘基事功时,神化迹象愈往后愈明显。

(一) 建构、神化、放大中心人物的历史书写传统

受古代科学水平所限,人们对气候变化、星辰运行等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只能用神鬼等迷信产物来敷衍解释。中古以降,史家在史书修撰过程中受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习惯用神秘主义思想神化和放大中心人物,以各种神秘、虚无的天象来阐释天授皇权、奉天承运的合理性。对于政治家,则强调其奉天命来辅佐“圣主”“明君”,传主或是天星下界,或是善于观测天象,能预知吉凶、先知未来。

纪传体二十六史,几乎部部都有通过对帝王的神化描述,强调皇帝受命于天的合理性。例如:《史记》中刘邦之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7]。《南齐书》载南齐武帝萧赜“生于建康青溪宅,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8]。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帝生而洁白,有异姿,襁褓岐嶷,长而渊裕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9]。北齐神武帝高欢出世前,其家“住居白道南,数有赤光紫气之异,邻人以为怪,劝徙居以避之”^[10]。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11]。元修宋辽金三史,依旧延续神化帝王的书写模式,如宋太祖赵匡胤“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12]。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13]。明修元史时称元太祖铁木真出生时“手握凝血如赤石”^[14]。清修《明史》时继续渲染圣主明君的神秘色彩,朱元璋“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15]。即使是民国前期,史家依然难脱神化帝王的窠臼,例如:《新元史》因袭《元史》的记述,称铁木真出生时“右手握凝血如赤石,面目有光”^[16]。《清史稿》中对清世祖福临出生时作如是神化记述:“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以语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翌日上生,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上生有异禀,顶发耸起,龙章凤姿,神智天授。”^[17]

官修史书尚且不遗余力神化和放大中心人物,更遑论民间传说、野史稗钞、小说话本、戏剧的附会、渲染。史传书写几经层累叠加,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越传越神,使之形象在民间固化,但已完全失真。帝王如此构建,名臣书写也是如出一辙。《行状》等史料,不仅如杨讷先生所言,记述已完全失真,而且其行文基本是仿照《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同时又借鉴了当时流行小说《三国演义》的内容。

(二) 刘基传记对《史记》书写模式的刻意模仿

各类刘基传记仿照《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极为明显。《史记·留侯世家》中对张良得兵书一事书写为:“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18]2034-2035}《史记》中为彰显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设计出仙人黄石公为考验张良,令其圯桥拾履,见其孺子可教,遂传兵书的奇幻情节。

明代史家亦不甘示弱,对刘基习天文之事,设计出比《史记·留侯世家》更为玄幻的情节。

先以《行状》为例，该文先言刘基“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19]479}。再借揭傒斯之语，将刘基誉为“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19]479}。继而又称刘基“在燕京时，间阅书肆有天文书一帙，因阅之，翊日，即背诵如流。其人乃大惊，欲以书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无事于书也。’”^{[19]479}。《明太祖实录·刘基传》与《行状》记述大同小异。“初，基于都市书肆，见天文书一帙，借阅之，翊日谈诵若流。其人大惊，欲以授基。基谢弗受，曰：‘已得之矣。’及丞高安，有进贤人邓祥甫者，通天文术数之学，见基而奇之，以其术授焉。”^{[20]1685}两部文献都只是夸张地强调刘基博学强记的能力，并未作过多的神化描述。

同一件事，在明中叶士人都穆的笔下，则变成了“诚意伯刘基，元末在燕京时，书肆有天文书一部，久无售者。基至，手其书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基昨所观，则已能成诵矣。翁大惊，乃以书授之，旦为语其奥。基归复往，则翁已闭肆，不知所之”^[21]。都穆设计了卖书人离奇失踪的悬念。何乔远在《名山藏》中，又是通过揭傒斯和邓祥甫之语，对刘基大加赞誉：“揭曼硕见之曰：‘此魏征之流，将来济时器也！’进贤有老人邓祥甫者，善天文，见基惊曰：‘公聪明绝世，器识宏深，当为一代伟人！’尽送所藏秘书于基。”^[22]焦竑的记述如同神话故事一般：“刘青田读书青田山中，忽见石崖豁开，公亟趋之，闻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恶，不可入也。’公入不顾。其中别有天日，见石室方丈，周迴皆刻云龙神鬼之文，后壁正中一方，白如莹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书四卷，怀出，壁合如故。归读之，不能通其辞。乃多游深山古刹，访求异人，至一山室中，见老道士冯几读书，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恳请，道士举手中书，厚二寸许，授公，约旬日能背记乃可受教，不然无益也。公一夕记其半，道士叹曰：‘大才也。’遂令公出壁中书，道士览之，笑曰：‘此书本十二卷，以应十二月，分上中下，以应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应人事耳。’乃闭门讲论，凡七昼夜，遂穷其旨。公拜请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因材而笃。昔子房、孔明并得其六，予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浊世矣。’嗟乎，自古异人经世，皆有所授，独子房授素书于黄石，其事大著，余多秘不闻，夫岂偶然之故哉。”^[23]

对照《史记》中关于黄石公赠兵书的记述可知，从《行状》《明太祖实录·刘基传》，再到都穆、何乔远、焦竑等人的记载，无一不是按照《史记》的书写模式，通过夹杂神秘人物、神秘事件等故弄玄虚的方法来神化中心人物。

《行状》记述陈友谅部将胡廷瑞之子与朱元璋谈投降条件时，“请禁止若干事。帝初有难色，公自后踢所坐胡床，帝意悟，许之”^{[19]481}。《明太祖实录》对踢胡床一事却并无记载，因为《明太祖实录》神化的中心人物是朱元璋而非刘基。不过，熟读《史记》者可能感到《行状》中刘基踢胡床一事似曾相识，因为此事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张良暗示刘邦封韩信“假齐王”之事如出一辙。“（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汉王大怒，骂曰：‘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蹶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24]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张良、陈平踩刘邦脚的行为，在《行状》中则变成了刘基踢胡床，无论是踩还是踢，如此书写，都是为了表现名臣随机应变的能力，彰显名臣辅佐的帝王是胸怀锦绣、深谙治道的真命天子。

（三）刘基传记书写过程中对三国文化的接受

《三国演义》作为明代第一部章回体小说，直至今日亦影响深远。《三国演义》的素材除了正

史《三国志》外,从西晋到元末,千余年间,融汇了大量民间传说、话本、戏剧的元素,虽然目前所见最早刊本为嘉靖元年(1522)本,但弘治时社会上已有抄本广泛流传。刘伯温对应的诸葛亮形象、开国诸王对应的蜀汉五虎将形象,已被民众普遍接受,这大概是弘治时期续封开国四王与刘基后裔的原因之一。《三国演义》虽然在洪武时期成书,但三国故事经史书记载,宋元话本、戏剧、民间故事的广泛传播,很多情节对于明初广大民众而言,早已耳熟能详。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已有根据宋元说书人讲说的三国故事提纲整理加工而成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在社会上传播。“平话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它已初步具备了《三国演义》的故事轮廓,是《三国演义》创作的基础。罗贯中正是在这样长期传说的基础上,参考了各种历史资料,再熔铸进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思想感情,最后加工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25]《三国演义》撰成后,很可能即有抄本在民间流传,或通过说话、戏剧等艺术形式进行传播。三国故事脍炙人口,直接影响了洪武、永乐时期史家、文人对历史人物形象的构建和书写。

神化刘基的目的是神化朱元璋,强调天授朱元璋皇权的合法与合理性。刘基之所以被包装、建构为神,究其原因,既与明初至中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与三国题材的元杂剧和名著《三国演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影响密不可分。

受宋元时期民间广泛流行的三国文化和明初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在朝野的心目中诸葛亮早已成为能掐会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机军师。虽然元明时期早已无“军师”这一职官,但因小说《三国演义》广泛流行,受到各阶层人士的追捧,因此在明初必须有一位能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的“神机军师”。基于此原因,《行状》不仅刻意模仿《史记》的书写方式,而且还掺杂了大量《三国演义》的内容。《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明初开国文武只有刘基一人号称精通天文,那么按照诸葛亮形象来构建刘基则是比较适合的选择。

陈友谅兵临金陵时,因朱、陈双方兵力悬殊,金陵诸臣关于战守问题争议不休。《行状》载:“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公独张目不言。帝召公入内。公奋曰:‘先斩主降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19]481} 彼时刘基刚入金陵朱元璋幕,身无寸职,仅是一个幕僚而已;况且,刘基不仅曾经仕元,而且又是元将石抹宜孙的重要幕僚兼好友,曾协助石抹宜孙镇压甬温一带农民起义、抵御朱元璋军队进攻。因此,刘基岂能不顾忌自己的履历和身份,张口即教唆朱元璋杀人?这种行为不仅与其性格不符,更与其身份相悖。彼时陈友谅兵临城下,身经百战的国初群臣岂能尚未交战即言投降?所谓“以城降”,最多是提出主和、谈判的建议而已。至于“奔据钟山”和固守城池并无任何区别,也只是如何防守、防守位置选择在哪里的问题。这些建议无论正确与否,根本达不到“斩”的程度。明初以打击开国勋臣为目的的洪武诸狱,涉案人员被清算时,未见一人以“主降”“奔据钟山”之事作为罪状。《行状》如此书写,不过是参考了《三国演义》的桥段而已。《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赤壁之战前夕,孙权为表示自己决计破曹的决心,在周瑜“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只恐将军狐疑不定”之语的刺激下,“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26]361}。这种以“斩主和者”的方式来神化和构建中心人物的书写模式,经常出现在小说、话本、戏剧之中,《行状》关于龙江之战的书写模式与小说等文学作品如出一辙。

《行状》中刘基提出的御敌之策是“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且天道后举者胜。宜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敌以成王业者,在此时也”^{[19]481}。平心而论,刘基的御敌之策并无新意,非常笼统,最多只是建设性意见而已。然而以神化朱元璋为目的的《明太祖实录》却并未选取“斩主降者”和刘基献策之事,而是强调朱元璋亲自制定“伏兵江岸,俟其至而击之”的作战计划,

刘基仅是附和“上言是也”而已^{[20]1687}。

三、刘基事功及其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

我们首先通过对《明太祖实录》所记刘基主要事功的统计，来看看彼时刘基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

表 1 《明太祖实录》中所见刘基主要事功

序号	卷、时间、页码	刘基事迹
1	卷八，至正二十年三月戊子，第 93 页	胡大海经略处州，浙东四先生赴金陵。朱元璋接见四先生。
2	卷九，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庚寅，第 118 页	鄱阳湖大战战前准备，刘基鼓励朱元璋决战。
3	卷十一，至正二十二年三月癸亥，第 139 页	叶琛南昌遇难，《明太祖实录》追记叶琛与刘基入金陵之事。
4	卷十二，至正二十三年五月癸酉，第 153 页	朱元璋设礼贤馆安置刘基等入幕文人。
5	卷十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壬午，第 238 页	设置太史监，任命刘基为太史令。
6	卷十九，至正二十六年三月甲辰，第 273 页	朱元璋与刘基、王祿论战时、战后治道。
7	卷二〇，至正二十六年四月己未，第 277 页	朱元璋与刘基、王祿论战时纾民困之策。
8	卷二一，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庚戌，第 295 页	朱元璋令刘基卜地定新宫址。
9	卷二四，吴元年六月癸酉，第 346 页	朱元璋与刘基论张昺奸佞事。
10	卷二五，吴元年九月癸卯，第 381 页	朱元璋与刘基、陶安讨论统一中原之事。
11	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午，第 384 页	改太史监为太史院，以刘基为正三品院使。
12	卷二六，吴元年十月壬子，第 386 页	置御史台，任命刘基为正二品御史中丞，仍兼院使。
13	卷二六，吴元年十月甲寅，第 388 页	命李善长、杨宪、傅瓛、刘基等定律例。
14	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乙卯，第 389 页	朱元璋与台宪官刘基、章溢、周桢等论纪纲法度。
15	卷二七，吴元年十一月乙未，第 416 页	朱元璋与刘基论制定历法。
16	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庚辰，第 489 页	朱元璋与刘基、章溢论治道、解民瘼手段。朱元璋不赞成刘基观点。
17	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辛巳，第 490 页	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朱元璋拒绝刘基以太子任中书令建议。
18	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乙酉，第 496 页	朱元璋与刘基谈战乱后治理，以刘基顿首附和而告终。
19	卷三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第 538 页	朱元璋与刘基论兵事。刘基聆听教诲。
20	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丁丑，第 610 页	刘基离职。因诛李彬事得罪李善长等。
21	卷三五，洪武元年九月癸卯，第 627 页	陶安去世。陶安曾认为自己谋略不如刘基。
22	卷三十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癸亥，第 674 页	朱元璋手书召还刘基。
23	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壬寅，第 799 页	朱元璋与刘基论待大臣之礼，对刘基观点表示赞同。
24	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辛酉，第 834 页	章溢去世，《明太祖实录》传略中谈及章溢与刘基同进金陵的往事。
25	卷四九，洪武三年二月戊子，第 973 页	朱元璋命省部官员与刘基定袍服之制。
26	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丙寅，第 1003 页	朱元璋与刘基谈帝王修省，刘基顿首吹捧。
27	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庚辰，第 1008 页	置弘文馆，刘基、危素等兼学士。
28	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第 1046 页	朱元璋颁《平沙漠诏》，刘基论元亡原因。
29	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壬寅，第 1066 页	朱元璋赐百官朝服公服，强调为刘基等考历代制度为之。
30	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丙辰，第 1071 页	刘基揭发杨宪党羽侍御史刘炳等不法事。
31	卷五八，洪武三年十一月乙卯，第 1145 页	朱元璋封刘基诚意伯并颁诰敕。
32	卷八四，洪武六年八月丁丑，第 1498 页	刘基因祭祀孔子时不陪祭而受胙，遭到罚俸处理。
33	卷九九，洪武八年四月丁巳，第 1685 页	刘基去世。传记书写生平。

注：根据《明太祖实录》整理。参见《明实录·明太祖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年版。

通过表 1 可知，刘基第一次出现在《明太祖实录》中为元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是年，胡大海经略处州，征刘基赴金陵。洪武八年（1375）四月，刘基去世。就其在《明太祖实录》中

的出现频率来看,虽然《明太祖实录》的中心人物是朱元璋,但被后世誉为“开国重臣”的刘基,这个出现频率实在过低。

(一) 刘基赴金陵始末

对于刘基赴金陵之事,《行状》大加渲染,编造出刘基早年游西湖,见到“异云”时,公开声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我当辅之”^{[19]479}的神奇故事。《明太祖实录·刘基传》也沿袭了这种说法。此后,各类明清的刘基传记,无一不对此事进行渲染,借以展示刘基能掐会算、未卜先知的才能。然而对于“望云”一事,周群先生认为“刘基游西湖时间约在至正九年(1349)”^[27]。彼时元末农民起义只是零星烽火,尚未成燎原之势。治理黄河工程还未开始,一只眼的石人尚未出现,朱元璋也不过是一个浪迹江淮、朝不保夕的游方僧人,刘基怎么可能预测到金陵会出王者?况且未来的王者也并非金陵本地人士,只是率众渡江突袭集庆路得手的“淮右布衣”而已。无论是杨讷先生还是周群先生,均对刘基西湖“望云”一事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明代文人钱谦益直言西湖“望云”之事都是刘基后人与“其门人弟子从而为之词,非公之本心也”^{[28]2110}。郎瑛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湖望云之事,“此野史所以误人也”^{[29]307}。

既然刘基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那么他究竟是怀着何种心态去金陵投奔朱元璋的呢?我们首先看《行状》中对于投金陵一事的记述:“会帝下金华、定括苍,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客闻之,遂亡去。公决计趋金陵。”^{[19]480}“适总制官孙炎以帝命遣使来聘,公遂由间道诣金陵。”^{[19]481}《明太祖实录》记述则为:“壬寅,金院胡大海率兵攻处州,克之。初,上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之黄龙山,谋取处州。元处州守将石抹宜孙遣元元帅叶琛屯桃花岭、参谋林彬祖屯葛渡,镇抚陈仲真、照磨陈安屯樊岭,元帅胡深守龙泉,以拒我师。久之,将士怠弛,皆无斗志。至是,深叛宜孙,间道来降,且言处州兵弱易取。大海闻之,大喜,即出军抵樊岭,与再成合攻之,大败其兵,连拔桃花岭、葛渡二砦,遂薄城下,石抹宜孙战败弃城,与叶琛、章溢走建宁,遂克处州。”^[30]从《明太祖实录》记载可知,处州之战,元军大败,胡深投降,元将石抹宜孙与叶琛、章溢弃城而逃。而石抹宜孙最重要的幕僚兼好友刘基的结局如何,《明太祖实录·刘基传》虽未谈及,但也提供了一丝线索,可资参考:“王师下处州,(叶)琛来降,金院胡大海以琛偕刘基送建康。”^[31]此条记述虽与“上既取婺州、定括苍,闻基名,遣使以束帛征之。基素以金陵当有王者兴,而上之威德日益盛,今来召,适当其时,遂与龙泉章溢、丽水叶琛等三人由间道诣金陵”^{[20]1686}条相悖,但却侧面反映出,此战后刘基可能是与叶琛一同投降,甚至不排除刘基已先于叶琛归顺的可能。

《国初事迹》记述:“太祖闻刘基、章溢、叶琛皆国士也,特遣宣与观,赍帛礼征聘基等到京,授基中丞、溢中丞、琛洪都知府。”^{[32]4}与刘基同时入金陵的当事人宋濂对此事的追忆是,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宝剑奉君(孙炎)。君作诗,以为剑当献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还之,为书数千言,开陈天命,以谕刘君。刘君无以答,逡巡就见君。置酒与饮,论古今成败,如倾河决峡,略无凝滞。刘君乃深叹服,曰:‘基始自为胜公,观公论议如此,基何敢望也。’”^[33]。郎瑛认为:“至正十九年(1359),天兵才下处州,命孙炎为守,炎三请,伯温方见,然后间道谒太祖于金陵,遂相辅焉。”^{[29]307}

上述史料对刘基投靠朱元璋一事的书写,除《行状》外,其他均未见刘基观乾象后主动投奔的记述,而是记述在朱元璋的招揽和孙炎礼贤下士的邀请下,刘基自认才不及孙炎,受孙炎感召和迫于形势才应聘入幕,而非主动投奔金陵。郎瑛对于孙炎“三请”的书写,还颇有些“三顾茅庐”的意味。只可惜孙炎在明朝建立之前即已捐躯,倘若孙炎不死,熬过洪武诸狱,且靖难未遭

清算，那么孙炎赠剑、三请刘基一事的历史书写，很可能再现一幕元末版“萧何月下追韩信”和“三顾茅庐”。

刘基之所以对入金陵投奔朱元璋麾下一事逡巡不定，实是元末士人心态使然。在不重科名的元代，末期竟有众多进士为故国殉难，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辟《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条，赵翼亦慨叹：“诸人可谓不负科名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34]706}连《行状》对刘基弃官原因，也不得不据实书写为“敕书至，公于中庭设香案拜曰：‘我不敢负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见授，无所宣力矣’”^{[19]480}。

我们再通过宋濂为徐方舟所撰的墓志铭，进一步了解刘基入金陵时的心态。“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书币起濂于金华山中。时则有若青田刘君基、丽水叶君琛、龙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双溪，买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绀青丝绳，立于江滨，揖刘君而笑，且以语侵之。刘君亟延入舟中，叶、章二君竟来讙谑，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载上黟川，丈夫觉之，乃止。濂疑之，问于刘君曰：‘此何人斯，诸公乃爱之深耶？’刘君曰：‘此睦之桐庐徐舫方舟也。濂故闻方舟名，亦起而鼓噪为欢，共酌酒而别。声迹不相闻者久矣。’”^[35]通过宋濂的追忆可知，浙东四先生在同赴金陵的途中偶遇徐方舟，徐方舟与刘基非常熟悉和要好，徐方舟以刘基“食周粟”的行为取笑他，刘基不但不生气，反而还盛邀其登船。叶琛、章溢也与徐方舟很要好，在船上“竟来讙谑，各取冠服服之”的行为，表面看是朋友间的戏谑，实则是刘、章、叶三人对自己背元而转投金陵行为的自我解嘲。

浙东四先生入金陵后，《行状》与《明太祖实录·刘基传》俱言刘基“陈时务十八策，上见之甚喜，嘉纳其言，谓曰：‘先生倘有至计，毋惜尽言’”^{[20]1687}。然而，同为《明太祖实录》，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戊子条对于朱元璋接见浙东四贤的记述却与《明太祖实录·刘基传》大相径庭。“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见，上甚喜，赐坐，从容问曰：‘四海纷争，何时而定？’溢起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上善其言，甚礼貌之。”^[36]朱元璋欣赏的是章溢的回答，而不是刘基的时务策。“甚礼貌”的对象是章溢，而非刘基。“先是，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至是，复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时，朱文忠守金华，复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祿、许元、王天锡至，上皆收用之。”^[37]也就是说，刘基仅是朱元璋礼贤馆中的一员，朱元璋对礼贤馆中的成员基本上都能做到一视同仁，并未给刘基过多的礼遇。

（二）刘基的战略格局与军事才能

著名的鄱阳湖大战是朱陈争霸的最关键一役。关于此战的历史记述中，神化朱元璋的描写非常清晰，但辅助人物则不尽相同，分张铁冠、刘基之说。

《行状》关于鄱阳湖大战的记述为：“胜负未决。公密言于帝，移军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皆从之。陈氏遂平。”^{[19]482}即使按照《行状》的记述，刘基的作用也仅是为朱元璋选择一个适合作战或对己方有利的黄道吉日，并无任何战略或战术上的建议。虽然天象之说荒诞不经，但古人受时代局限，对于天象、吉日之类玄之又玄的说法深信不疑。《明太祖实录》记述则为“庚寅，上亲帅舟师伐陈友谅。……徐达进曰：‘师直为壮，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刘基亦言于上曰：‘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愿主公顺天应人，早行吊伐。’上曰：‘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至是，遂率徐达、常遇春等各将舟师发龙湾”^[38]。不难看出，会战开始之前，徐达强调的是军威、士气，而刘基强调的是天象的预兆。可笑的是，作为三军统帅的朱元璋，竟然在刘基所言天象的基础上，强调自己也会观天象，且观测的结果与刘基一致！这大概

就是各类史料反复强调刘基会观天象的原因所在吧。对于朱元璋会观天象之事,在《明太祖实录》中出现过多次,被修撰官大书特书,极为夸张,关于此事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国初事迹》对鄱阳湖大战的记述为:“伪汉主陈友谅亲率高稍子战船,兵号六十万,围江西南昌。”^{[32]7}“声息到庐州,太祖才知之,谓徐达等曰:‘为一庐州而失江西大郡,岂兵家之法?’遂解围,亲率战船蔽上至鄱阳湖。友谅闻援至,解南昌围,退,出康山与太祖大战。太祖颇惧,问刘基气色如何,基曰:‘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友谅果中流矢死,兵船尽降。”^{[32]8}《国初事迹》作者刘辰早年入李文忠幕,跟随李文忠经略浙江。永乐初,刘辰因“知国初事,召至,预修《太祖实录》”^[39]。其著属于当事人忆当年事,可信度较高。通过此条史料可知,朱元璋面对陈友谅六十万大军,曾产生过畏敌情绪,刘基并不是用天象、吉日等装神弄鬼之术去鼓舞军心士气,而是以士气旺、军威壮之语来激励朱元璋决一死战。这一记述并未神化刘基。

到了正、嘉时期,关于鄱阳湖大战的记述中神化刘基的书写愈见明显。士人梁亿对刘基的记述已近神化:“太祖亲征陈友谅,大战于彭蠡湖,与伯温皆在御舟,以观将卒搏战。伯温忽跃起大呼,太祖亦惊起,疑其作乱,见伯温双手麾之,连声呼曰:‘难星过,可更舟。’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晌,旧舟已为敌炮击碎矣。及后胜负未决,伯温密言于太祖曰:‘可移军湖口,期以金木相克日决胜。’太祖从之,遂平陈氏。”^[40]刘基即使真会观天象,也不至于在硝烟弥漫的白昼看见即将来临的“难星”。刘基请朱元璋及时“更舟”的原因,要么是在观战过程中发现敌军战舰的火炮正向己方旗舰瞄准,要么是发现旗舰受损,或因战场事态,需要及时更换指挥位置。鄱阳湖大战既无东风可借,陈友谅又未将战船连锁,那么书写者只能对史实添枝加叶,通过对“难星”“更舟”等事大加渲染来神化刘基。

另一位正、嘉时期文人郎瑛的记述则近乎神话故事。“太祖与陈友谅战鄱阳湖时,有周颠仙者谒道左,上命登舟,一语不发,上问友谅何如,对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个桶,又一个桶。’上怒,令推水中,见其不溺而行于水面,复召之同舟。无何,舟果覆,众皆惊骇,得周而免。又有铁冠道人张中字景华者,时亦从太祖在舟,友谅中流矢,两军莫知也,道人望气,语上曰:‘友谅死矣。’使上作文遥祭,陈军遂为夺气,败去。吁!二人皆仙也,今人但知刘伯温金木相克使太祖避于午时之说,而不知二仙已从太祖于舟。天时、人事已际遇矣,友谅虽势大,安能胜之!”^[41]“战鄱湖则御舟胶于沙滩,韩成假帝投水,使无金木相犯之日以决一胜,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有在,固不能逃贯睛之流矢也耶?”^[42]郎瑛的记述虽然带有极强的神化和小说家色彩,但却道出了“更舟”的原因,即朱元璋旗舰搁浅,既无法变换指挥位置,又在敌方炮火射程之内,已成为敌军的靶子。“更舟”并非刘基看见了“难星”,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明太祖实录》的记述则是“友谅骁将张定边奋前欲犯上舟,舟适胶浅,我军格斗,定边不能近。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通海来援,舟骤进水涌,上舟遂脱”^[43]。由此可知,朱元璋的旗舰确实一度搁浅,并遭遇敌军猛烈进攻;常遇春力战,击退敌军;因俞通海援军赶到使湖面水位上涨,朱元璋的旗舰才摆脱危险。可见,根本没有“更舟”一事,更无刘基看到“难星”一说。

鄱阳湖大战从双方正式交兵,到陈友谅“流矢贯睛而亡”,会战历时三个月。《明太祖实录》用两卷篇幅进行记述,洋洋万余言,竟未提刘基一字,却直言张铁冠在谈笑间已“算”出陈友谅阵亡^{[44]165};周颠仙在战前即已预测到朱元璋虽会获胜,但也会损兵折将^{[44]168}。虽然记述张铁冠、周颠仙带有神化朱元璋和故弄玄虚的色彩,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刘基在鄱阳湖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朱元璋的侍卫俞本曾亲历鄱阳湖大战,在其回忆录《纪事录》中亦无一字关于刘基在此

役事功的记述。

对于刘基坚决不奉小明王，并阻止朱元璋使用龙凤年号、尊奉小明王之事，《行状》作如是记载：龙江之战后，“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公大怒，骂曰：‘彼竖牧尔，奉之何为？’遂不拜。适帝召公，公遂陈天命所在，帝大悟，乃定征伐之计”^{[19]481}。所谓“竖牧”，即小牧童、放牛小子之意。朱元璋出身赤贫农家，不仅当过“竖牧”，还当过连“竖牧”都不如的寺院行童，又做了多年乞丐，其身份、地位远不如牧童。当过和尚、乞丐之事已成为朱元璋的心结。从建国后朱元璋对“僧”字特别敏感的事例看，即使作为当时最成功的人士，对自己当过和尚、乞丐的“黑历史”也非常自卑。刘基岂能不顾朱元璋的感受，公开说出那种侮辱之语？《行状》如此记述，几近荒唐，连钱谦益都看不下去了。他认为，“《明太祖实录》及本传皆不载此事。是时上方奉龙凤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应孟浪若此”^{[28]2113}。

事实上，刘基虽然不像《行状》所述的那样“孟浪”，在中书省公然骂街，但刘基在龙江之战后，确实明确反对过朱元璋营救小明王，其事见于《国初事迹》。当时“张士诚围安丰，刘福通请兵援，太祖亲援。初，发时，太史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何处？’太祖不听”^{[32]7-8}。朱元璋之所以拒绝接受刘基的建议，是因为彼时朱元璋深知自己处于强敌环伺、三面夹击的困境之中——北面有元军、东面有张士诚、西面有陈友谅，三者俱对金陵虎视眈眈。控制江淮的小明王武装至少还能抵御元军，做战略缓冲。朱元璋在舆论上攻击陈友谅不仁不义、弑主自立，而自己如果对形式上的君主小明王见死不救，那么不仅会遭到舆论的挞伐，更危险的是，若小明王被俘或被杀，其部属如果倒向元、张、陈任何一方，将会导致北方门户洞开，任何一路敌军都会兵不血刃、长驱直入，进犯金陵，届时自己将腹背受敌，压力陡增，辛苦草创的基业，很可能毁于一旦。如果朱元璋顺利救出小明王，则不仅能占据舆论高地，更可以将小明王控制于手中，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通过此事，朱元璋、刘基的军事能力、战略格局高下立判。

吴元年（1367）九月，朱元璋又和刘基、陶安讨论统一全国的问题。朱元璋提出：“张氏既灭，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45]382}刘基回答：“土宇日广，人民日众，天下可以席卷矣。”^{[45]382}朱元璋对刘基的回答并不满意，他认为：“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恃众。吾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逐，每临小敌，亦若大敌，故致致胜。今王业垂就，中原虽板荡，岂可易视之？苟或不戒，成败系焉。”^{[45]382}刘基坚持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北进中原的战略建议。他说：“近灭张氏，彼闻而胆落，乘胜长驱中原，孰吾御者？所谓迅雷不及掩耳。”^{[45]382}然而刘基的战略意图又被朱元璋否决，朱元璋认为：“深究事情，方知通变。彼方犄角，相为声援，岂得遽云长驱？必凭一战之功，乃乘破竹之势。若谓天下可以径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尝观之，彼有可亡之机，而吾执可胜之道，必加持重，为万全之举，岂可骄忽以取不虞也！”^{[45]382}

显而易见，明政权建立前，无论是参与龙江之战、鄱阳湖大战，还是营救小明王与否，以及讨论北伐蒙元、统一全国的军事问题，刘基的战略格局、军事理念与朱元璋的战略意图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洪武元年（1368）三月，朱元璋与刘基对军事问题进行讨论。朱元璋认为：“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将非人则兵必败。是以两军之间，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好的将。”^{[46]538}刘基则认为：“臣荷圣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观庙算，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若主之胜也。然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此其所难也。”^{[46]538}最后，朱元璋提出：“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

战阵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46]⁵³⁹讨论最终以刘基“无言以对”“心悦诚服”而结束。

此次交谈,朱元璋提出精兵不如良将的观点,而刘基先是附和朱元璋观点,盛赞朱元璋善于用兵、任将,继而又明知故问,抛砖引玉。朱元璋则顺水推舟,自诩自己不仅不拘泥古法,而且还能身先士卒,随机应变。通过此番对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刘基并不是那种迂腐木讷的文人,而是非常工于心计,善于在朱元璋面前“献拙”,而不是弄巧。刘基自谦地说:“得侍左右,每观庙算,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46]⁵³⁹此言虽是刘基自谦之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吹捧朱元璋,但也可以窥知,刘基在战争时期虽然能够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讨论,但因其军事理念往往属于纸上谈兵,且与朱元璋战略思想相左,故朱元璋创业之时,刘基未获得任何军职,只是担任太史令(院使)之类负责纯文字工作的官职。吴元年(1367)成立御史台后,刘基任御史台副职的同时仍兼任太史令。洪武三年(1370)置弘文馆,刘基兼任学士。从刘基任职情况看,除了台宪官涉及司法、监察事务外,无论太史令,还是弘文馆学士,都是从事文字工作,与军事无任何关系。既然连刘基自己都认为朱元璋知人善任,那么刘基所任职务当是实至名归。刘基文采出众,文章传世,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家,这点毫无争议,但若将刘基称为军事家,却有些其实难副。

(三) 刘基的天文才能考略

《国初事迹》载:“基知天文,太祖尝以‘国师’、‘先生’称之。”^[32]⁴“国师”这个称呼很值得玩味。所谓“国师”,在明代语境里基本是指内附来朝的青、藏、川西地区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明中叶后,诸如成化佞幸李孜省、继晓,嘉靖佞幸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等都是“国师”级别的“神仙”。虽然这些“神仙”施展“法力”形式不一样,但装神弄鬼、愚弄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手段,却如出一辙,并无本质区别。

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对自己“国师”的使用:朱元璋平灭陈友谅后,张士诚已如瓮中之鳖,不足为患。朱元璋开始着手进行定都金陵的准备。“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近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47]所谓“卜地”,即利用堪舆之术来选择新宫地址。古代堪舆之术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确实有一定合理性和科学性,但若与所谓风水、星象结合,则毫无科学性可言。星野之说,不过是古时江湖术士利用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通过对星辰运动等自然现象的曲解来故弄玄虚、诓骗钱财的手段而已。现代社会科学昌明、人文鼎盛、法律健全,尚且有此类人员招摇过市,更遑论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无法比拟的明代。从刘基看风水、选皇宫位置的事例看,大概在朱元璋的心中,刘基也就是自己的风水先生而已。

然而刘基“卜地”之事,到了明中后期,又被史家借题发挥,衍生出更为神奇的故事,例如建南京紫禁城一事。“上初建都金陵,时刘伯温相地,筑前湖为正殿基。业已植桩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后。伯温见之,问曰:‘谁移此者?’上曰:‘我也。’诚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后世不免迁都之举。’”^[48]这种事后诸葛亮的书写方式,无疑是为了神化刘基,显示刘基能预测未来。

朱元璋和刘基曾就历法修订进行过一次对话:“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刘基,谓曰:‘古者以季冬颁来岁之历,似为太迟,今于冬至,亦为未宜。明年以后,皆以十月朔进。’初,戊申历成,将入梓,基与其属高翼以所录本进。上览之,谓基曰:‘此众人之为乎?’基曰:‘是臣二人详定。’上曰:‘历数者,国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

苟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辞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须各尽其心，必求至当。’基等顿首而退，乃复以所录再加详较而后刊之。”^[49]

历法是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分支，制定历法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天文知识。由于刘基是朝野公认的精通天文历法者，故朱元璋任命他主持制定历法。然而，从上述史料看，朱元璋对刘基制定的洪武元年历并不满意，只是对刘基的批评很含蓄。朱元璋先是建议刘基应提早进献次年历，继而又通过春秋典故来批评刘基没有群策群力，而是以一二人之力去修订历法，导致进献延迟、讹误较多。此例足见刘基对历法的研究虽不算徒有虚名，但也只是流于表面，不算精深。

再看明建国后的一次祈雨不验事件。《明太祖实录》载曰：“初，上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长及基等留守京师，且语基督察奸恶，以肃辇毂，虽内府之事，亦宜纠举。基素刚严，凡中书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监工匠不肃，基启皇太子捕置诸法。宿卫舍人弈棋于直舍，基按治之，人皆侧足畏基。会中书都事李彬奸事觉，彬素附李善长，窃弄威福。善长诿基缓其狱，基不允，遣人驰奏请诛彬，上可其奏。时天旱，善长等方议祷于神，而诛彬之报适至。善长曰：‘今欲祷雨，可杀人乎？’基怒曰：‘杀李彬，天必雨。’斩彬，善长衔之。及上还，怨基者多诉于上前。善长亦言基专恣，语颇切。上皆不听。会基有妻丧，因请告归，上许之。”^[50]嘉靖时期官员李默则作如是记载：“京师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祷求不应。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抚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捆于马房。及谕中书省、御史台、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刘基言三事。一曰：‘出阵亡病故军妻数万，尽令寡妇营居住，阴气郁结。’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尸骸不收。’三曰：‘张士诚投降头目不合充军。’太祖曰：‘寡妇听其嫁人，不愿者送还乡里依亲。工役人什防宁家。投降头目免充军。’后旬日仍不雨，太祖怒曰：‘刘基着还乡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驾船只发汴梁安置。’”^{[51]620}

上述史料都记述了刘基祈雨不验之事，此处我们不去评价刘基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品质，只讨论刘基的天文才能。观云识天气，即使在古代也应是所谓精通天文人士的基本功。成化佞幸李孜省刚出道时，“会蓟州霖雨灾，孜省约卯却霁，午而雨止。已，果然。未几，京师又雨，一祷而太阳见”^[52]。李孜省虽无呼风唤雨的超自然能力，但却对气象变化规律有一定的研究，具备相当程度的气象知识。大学士刘吉认为李孜省祈雨灵验的原因是“迺见月宿在毕，天将阴雨，遂奏请祈祷”^[53]。可见，李孜省能够通过对星辰、云层等自然现象细微变化的观察，准确地预知未来天气变化。祈雨或止雨的成功，可以视作一次准确的天气预报。刘基预测天气的能力连李孜省这样一个佞幸都不如，又谈何善于观天象？所谓刘基精通天文之说，不过是古人故弄玄虚，神化中心人物的手段而已。

（四）刘基的政治才能及其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

至正二十六年（1366）四月，朱元璋与刘基、王祚讨论“纾民力”的问题。朱元璋提出：“兵戈未靖，四方凋瘵，军旅之需，一出于民，吾欲纾其力，奈何？”^{[54]277}刘基回答：“今用师之日，必资财用，出民所供，未可纾也。”^{[54]277}刘基话音刚落，即遭到朱元璋的驳斥，朱元璋说：“我谓纾民之力，在均节财用，必也制其常赋乎？国家爱养生民，正犹抱保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培敛以腴其脂膏，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54]277}刘基也只能述以“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54]277}来应对朱元璋的批评。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六，朱元璋大宴文武，宴席结束后，与刘基等谈及自己因忧民而

“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55]486}。刘基回答：“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55]486}刘基之语并无不当，然而却碰了个软钉子。朱元璋随即批驳了刘基“宜少纾其忧”的建议，他说：“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谨，或生疾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55]487}此番言语，弄得刘基无言以对。

正月初九，朝会结束，朱元璋又与章溢、刘基谈论治道。刘基认为：“自元氏法度纵弛，上下相蒙，遂至于乱。今当维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56]488}刘基加强法制建设的观点，其实非常正确，但却遭到朱元璋反驳。朱元璋认为：“不然。夫经丧乱之民，思治如饥渴之望饮食，创残困苦之余，休养生息犹恐未苏，若更驱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以鸩，将欲救之，乃反害之。且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实惠。若徒事其名，而无其实，民亦何所赖焉？”^{[56]489}此番言语无疑令刘基非常难堪，幸有章溢在一旁打圆场说：“陛下深知民隐，天下苍生之福也！”^{[56]489}，这才结束了尴尬局面。

正月初十，朱元璋下诏设立东宫兼官。刘基建议：“适闻中书及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57]491}此建议又被朱元璋当场拒绝。朱元璋认为：“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求登高冈而却步，渡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效彼作中书令乎？”^{[57]491}

正月十四日，朱元璋又与刘基谈治道。“上谓刘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养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上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故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基顿首曰：‘陛下尽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传》曰：以仁心行仁政。实在今日，天下之幸也。’”^[58]这次谈话又是朱元璋对刘基观点进行批驳。上次刘基提出加强法制建设，朱元璋则大谈仁政；此次刘基提出仁政，朱元璋又大谈教化，令刘基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最终只能以顿首吹捧来应对。

如前所述，虽然《明太祖实录》的中心人物是朱元璋，修撰实录的目的也是为朱元璋歌功颂德，构建其无所不能的明君圣祖形象。然而从不足十日的四次谈话来看，批驳刘基的观点，似朱元璋有意为之。由此可见，因刘基的政治理念与朱元璋的治国思想完全相悖，故刘基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似无足轻重。是时，明政权已建立，就治国理政的人选而言，刘基已是可有可无。

刘基在朱元璋心中地位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刘基既非“渡江”班底，又有仕元的经历。文武群臣与朱元璋关系亲疏，一般以“渡江”为分界线。晚明士人许重熙认为：“开国文臣最先幕府从渡江者李善长、汪广洋、杨元杲、李梦庚、毛麒。渡江后有若陶安、宋思颜、杨宪、王恺、孙炎等。又六载，下浙东乃得宋濂、刘基、叶琛、章溢。”^[59]很多非“渡江”的开国武臣都有过仕元、仕张、仕陈的经历，刘基仕元经历似乎不应成为“案底”“前科”。然而，朱元璋对曾经仕元的文人非常反感。早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的创业时期，因降官宋伯颜不花劣迹昭彰，朱元璋在雨花台亲自对其拷讯。朱元璋斥责道：“宋佥事，你是元朝风宪官，不能死节，归我又授以耳目，亦不能与人辨曲直，拷掠诬承，谄吾一时之喜，是汝罪否？我替元朝打死这失节老贼！”^[60]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归降文人的反感发自内心。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又规定：“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61]刘基曾协助石抹宜孙镇压农民起义、抵抗朱元璋军的往事，更是成为其无法抹去的“黑历史”和无法被重用的依据。

洪武八年（1375），浙籍士人桂德“授晋王右傅，陞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敢当宋濂、刘基。’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足取。’是时，刘基已归，景濂方近密，而上于德称优奖如此”^{[51]620}。朱元璋与桂德的谈话，发生在刘基因病返乡之后，朱元璋对刘基的这番评价，甚至可视为对刘基的盖棺论定。“峻隘，不足取”之说，足见朱元璋对刘基的评价并不高。

不仅朱元璋对刘基的评价不高，即使到了百余年后的嘉靖时期，统治者和了解国初历史的臣僚对刘基的开国功业也并不完全认可。嘉靖七年（1528），“增诚意伯刘基牌位，次六王之下”^[62]。这个排序随即引起朝臣质疑。嘉靖十六年（1537），“礼部上言，祖宗时定列功臣位次，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次伯。洪武功臣以徐达等自为序，永乐功臣以张玉等自为序。今观庙庑所列，以诚意伯刘基列于六王之次，群公之上，似为不伦。今营国公郭英定列从祀之时，宜将刘基亦照封爵定列”^{[63]4168}。世宗的批复很明确，“庙中配享与朝廷宴礼相同，岂可让私？位次以爵序”^{[63]4168}。从世宗钦定太庙从祀排序来看，至少在世宗和礼臣的心目中，刘基的开国贡献肯定在公侯之下，能使之进入太庙从祀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之举了，浙籍官员试图将刘基列在六王之后的做法，完全是非分之想。

（五）刘基并非朱元璋的“子房”

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到班固在《汉书》中的书写，再通过宋元三国题材的话本、杂剧和明初小说《三国演义》的传播，张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辅佐布衣天子刘邦平秦灭楚、一统江山的能力，既在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又影响到史家对名臣形象的构建和书写。

明初文人对张良的历史地位极为认可。朱升在为朱元璋起草敕封汪广洋、刘基伯爵的诰命中称：“朕观往古俊杰之士，能识真主于草昧之初，效劳于多艰之际，终成功业，可谓贤知者也。汉之张子房、诸葛亮独能当之。”^[64]《行状》中言：“上亦甚礼公，常称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19]479}众多史料按《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记述刘基事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司马迁所著《史记》发凡启例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朝野上下多受三国文化影响。诸葛亮虽然神机妙算，但最终无力回天，六出祁山皆无果而终。而张良则能辅佐刘邦平秦灭楚，最终建立大一统汉朝，三国文化中亦多处强调张良的历史作用，《三国演义》多次通过人物对话的形式来表现张良的重要性。例如：第二十回，汉献帝与董承在功臣阁中，汉献帝“因指左右二辅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张良、酈侯萧何耶？’承曰：‘然也。高祖开基创业，实赖二人之力。’”^{[26]169}第三十六回，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称，“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26]297}。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在新野又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认为诸葛亮不仅可比管仲、乐毅，甚至“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26]300}。更为重要的是因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出身相似，故“明祖行事多仿汉高”^{[34]737}。基于此原因，中晚明士人往往将朱元璋比作刘邦，将李善长、徐达、刘基比作萧何、韩信、张良。“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者，十有八人而已。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之将略踰于韩信，刘诚意之智计埒于张良，乃若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诸人，皆无非三杰之俦匹，而视十八将瞠乎其後。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65]廖道南对刘基被称“子房”的解释是：

“夫子房椎击沙中，何异于伯温之愤方氏也？伯温受天文于邓祥甫，又何异于圯上老人之三略哉？”^[66]

然而朱元璋在册封伯爵的诏书中，将汪广洋和刘基都称为“子房”“孔明”，其顺序是“先广洋而次基”^[59]。显而易见，刘基并不是大明“子房”的唯一人选。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刘邦与张良、朱元璋与刘基的关系进行简要对比，来看看刘基究竟是不是朱元璋的“子房”。刘邦对张良言听计从；朱元璋对刘基所言，至少从《明太祖实录》中看，多数是持批评和保留意见。汉六年（公元前201）大封功臣，张良虽然“未尝有战斗功”，但刘邦认为“运筹策帷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18]2042}。张良婉拒，“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18]2042}。最终刘邦封给张良的留地也是食邑万户^[67]。再看朱元璋给刘基的待遇：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刘基获封伯爵，其排位是第一批封赠的公侯伯中的最后一名，食禄仅二百四十石，比忠勤伯汪广洋少了一百二十石，与同为文臣的李善长食禄四千石相比，更是天渊之别。而且刘基的爵位是不世袭的流爵，相较徐达等世袭罔替的世爵而言，根本没有可比性。汪广洋的伯爵诰敕中并未提及爵位是否可以世袭，而刘基的诰敕却明确写出了“子孙不世袭”。试想，如果朱元璋真把刘基当成了自己的“子房”，那么朱元璋这个“刘邦”也实在太过于吝啬、刻薄少恩了。

四、官方“制造”刘伯温的原因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对刘基的事功有了一定的了解。既然刘基的历史贡献并不突出，那么为何官方热衷于制造刘基，而不去制造李善长、汪广洋等人？

（一）刘基是唯一符合造神标准的开国文臣

元末，浙东四贤同时投奔金陵。浙东四先生除刘基外，宋濂是一位纯正的文人儒者，不谙玄学谶纬之术，一直从事文字工作，未获封爵，晚年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被流放四川后去世，未获得官方平反。叶琛在明建国之前因南昌叛乱遇难。朱元璋甚为欣赏的章溢，也于洪武二年（1369）病故，生前死后均未被封爵。洪武三年（1370）大封开国文武，李善长虽是文官，但却位列功臣之首。正常情况下，官方若选择神化对象，李善长肯定是最佳人选。可惜李善长虽然行政能力很强，但却完全不谙天文，虽然致仕多年，仍未能躲过洪武大狱，不仅被夺爵，还被逼自尽。排名刘基之前的忠勤伯汪广洋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赐死。李、汪二人虽是因朱元璋罗织罪名而死，但终明之世也未能得到官方的平反。同为获爵文官，刘基可谓开国文官中仅存的“硕果”。刘基不仅被封爵，而且于洪武八年（1375）善终。是时，洪武大狱未兴，且刘基与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功臣集团骨干素来不睦，死后未受胡案牵连、未遭政治清算，故排名伯爵末位的刘基顺理成章地“递补”为文臣封爵者第一位，势头盖过了李善长。加之刘基号称熟知天文地理，自然成为朱元璋的“子房”和“孔明”不二人选，包装与神化刘基成了必然。

神化刘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朱元璋对天象之说极为热衷。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首次册封开国功臣公侯伯爵位，其中公爵六人、侯爵二十八人、伯爵二人，共计三十六人。封爵总人数似刻意按照三十六天罡星之数；侯爵二十八人皆为一线将领，应是所谓上应二十八宿，模仿东汉云台二十八将的做法。朱元璋曾说：“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68]这种自吹自擂的表述，既自我标榜了其天命所归，又显示了他精通天象的才能。《明太祖实录》中多次记载朱元璋通过所谓的天象来预测敌军入侵、判断敌军进攻方向等玄之又玄的事例。例如：洪武十年（1377）九月，先后出现了“太白犯进贤星”“荧惑犯舆鬼”的星象。

朱元璋遂借机大做文章，下敕中书省称：“荧惑犯舆鬼，主冢宰凶，贵人当狱死，不尔则火灾。朕尝窃思：上帝好生，故垂象以警人，使省不觉之过。不改，故为之愆。故特敕中书，使诸大臣皆知务修德以禳灾，复恐西戎有虞，可令河州严加备御。”^[69]一个很正常的自然现象，被朱元璋利用古人迷信的心理来警告胡惟庸、汪广洋，可谓政治手段高超。然而，朱元璋居然还曾用行星、流星、彗星运行的自然现象去预测西北边患，这种做法实在匪夷所思。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朱元璋派遣镇抚李杲去西北巡视，朱元璋让李杲向西凉驻军将领濮英、宋晟转达的指示竟是“七月二十日晚，彗星出西北，主有贼兵出入，宜警备”^[70]。这种通过观星象来预判敌军动向的做法，实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更为荒唐的是，洪武二十年（1387）五月，朱元璋居然直接派人敕谕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宋国公冯胜，说：“今天象水火相犯，殆至八月天象屡有警，诸将宜严号令、整行伍、远斥候，以逸待劳，则必有当之者矣。”^[71]朱元璋以天象变化为借口，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变进攻为防守的行为，着实荒唐至极。然而在帝制时代，对帝王，尤其对开国君主，是不可置疑的，开国皇帝是万能而神圣的象征，其后世子孙必须为其荒唐行为做出最合理的解释。为了衬托朱元璋看天象指挥、遥控军队的正确性，那就必然要神化一位全能的辅翼者来显示中心人物做法的合理性。如此一来，号称熟悉天文的刘基便“当仁不让”地陪着朱元璋一同走上神坛。

（二）浙籍官员与刘氏子孙推波助澜

明初刘基被授诚意伯爵位，此爵位在当时的伯爵中排名最后、食禄最低，刘基的职务也仅是御史中丞而已。后来，朱元璋“追念基功，又悯基父子皆为惟庸所厄，命增其禄，予世袭”^{[72]3782}。永乐时，刘基孙刘鴈去世后，爵位停袭^{[72]2783}，其后裔最多恩荫博士之类的闲职散官。虽然刘基与朱棣无任何恩怨纠葛，但在永乐时期重修的《太祖实录》中对刘基事迹的记述却不多。从这个角度亦可知，在朱棣心中，刘基的开国功绩并不大。

成化初，杨守陈应邀为《刘基文集》作序时盛赞刘基，称：“汉以降，佐命元勋多崛起草莽甲兵间，间谄文墨者殊鲜。子房之策，不见辞章；元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19]3}由此拉开了浙籍士人神化刘基的大幕。弘治时期恢复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刘基子孙官职，常、李、邓、汤四王后裔被任命为南京锦衣卫带俸指挥。因浙籍给事中吴仕伟提出“诚意伯乃功臣，其后不当为博士”^[73]，故从刘基九世孙刘瑜这一代开始被授予武职，成为处州卫指挥。在浙籍朝臣的不断怂恿下，正德时期，刘基被追赠太师，追谥文成^{[72]3782}，地位陡增。

浙籍官员热衷于“制造刘伯温”的原因，实系乡土情结使然。众所周知，明代开国功臣集团以淮河流域人员为骨干。浙江虽然在明代即为经济发达、人文鼎盛地区，但开国将领却无一人。明初第一批封公侯伯爵位的三十六人中只有刘基一人是浙江籍。从仁、宣时期开始，浙江文魁闪耀，科第蝉联，很多浙籍士子通过科举功名进入朝堂。浙籍官员在谈及国初历史时，虽无法篡改既成事实的历史事件，但却可以通过其掌握的话语权来改变乡贤的历史评价，提升乡贤的历史地位。时至今日，很多地方文史爱好者也极度热衷于对本省、本地曾出现过多少位历史名人进行统计、书写和宣传。今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习惯于以乡情结成政治纽带的古人？

嘉靖“大礼议”事件后，朝野内外投统治者之所好，对宗法继承、仪礼制度等格外关注，尤其热衷于所谓的世系。加之弘治时期在浙籍官员推动下，官方即已认定“刘基乃佐命元勋”，“勋烈与六王相表里”^{[74]360}，故嘉靖朝的浙籍官员利用“大礼议”事件余波继续推波助澜，不断神化刘基，提高刘基的地位。嘉靖十年（1531），浙籍刑部郎中李瑜上疏，认为“帷幄奇谋，中原大

计,往往属基,故在军中有‘子房’之称,剖符发诸葛之喻”,提出刘基“宜侑享太庙,其九世孙瑜宜嗣伯爵,与世袭”的建议^{[72]2782-2783},得到世宗的允许。特别是李瑜再次强调刘基有“翊运之功”,且早已被定性为“佐命之臣”^[75],非常能左右世宗的想法。因此,嘉靖十一年(1532)刘瑜获准袭爵,并获免死诰券。刘氏家族自此重振。刘瑜更是一步登天,不仅重获伯爵,而且由虚职转为实职,从处州调入南京。嘉靖十二年(1533),刘瑜升南京中军都督府;嘉靖十三年(1534),领南京前军都督府直至去世^[76]。

嘉靖十六年(1537),议礼新贵武定侯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动人听闻”^[77]。因该小说的主笔皆系“越人”^[59],故他们完全按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来设计、描写刘基功业。此小说中,刘基几乎是诸葛亮的翻版,形象构建已经近乎神化。如描述应昌之战一章中,刘基神机妙算,指挥若定;主帅李文忠在刘基面前自称“末将”,对刘基唯命是从^[78]。虽然在《英烈传》中生擒张士诚、射死陈友谅成了郭英的战功,但郭英所立功勋都是在朱元璋的英明指挥和刘基的神机妙算下实现的。在郭勋的推动下,《英烈传》从宫廷向社会传播,在宫闱和上层官僚心中产生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小说、故事等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及影响,远远胜过史学。刘基形象不仅彻底实现了由人到神的转变,而且还获得从祀太庙的殊荣,福泽其子孙。

嘉靖二十八年(1549)诚意伯刘瑜之孙刘世延袭爵后^{[74]361},横行地方,无恶不作。刘世延深知其地位来自祖荫,故时刻不忘彰显其祖上,以其祖上的光环作为自己不法行径的护身符。隆庆二年(1568),刘世延获准复爵,进京谢恩时,居然提出先祖刘基“开国功勋,著在社稷,而身后恤典出魏国公徐达及新建伯王守仁下,乞改给祭葬享堂仪物及爵级勋阶散官”^{[79]2195}等无理要求。刘世延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廷臣的参劾,给事中王之垣指责刘世延“挟祖勋,要君宠,悖慢不敬”^{[79]2195}。通过此例可知,虽然是时刘基形象已构建完成,并成功地走上神坛,但在一些熟读国史、头脑清醒的官僚心中,刘基的功业不要说不能和徐达比,甚至连王守仁都比不了。李邦华在纠劾十三代诚意伯刘蔭臣不法行为的奏疏中直言:“刑郎李瑜代为奏请,始令其九世孙瑜嗣爵,而世延继之,竟著逆节。蔭臣继之,又乱朝政,祖宗济恶,大率以家传天文,善占王气,惑世自雄,与他姓勋旧斤斤守法者不同。”^[80]

崇祯时期,许重熙撰《五陵注略》,“持论颇异”,“朝论讳之”^{[81]684}。“至言刘伯温非渡江勋旧,袭封出乡人之推戴,前人已有言之。刘孔昭一见大怒,适温相恶倪元璐,恐其入阁。孔昭遂以倪钢妻事与许并股作疏,意重在许开大狱,上不允,亲票旨放归,许之书遂播行。”^{[81]684}可见,刘氏子孙一直飞扬跋扈,而且刘基已经到了“说不得”和“不可置疑”的程度。因为许重熙质疑成说,十四代诚意伯刘孔昭恼羞成怒、欲盖弥彰,全然不顾内忧外患的时局,凭一己之私,竟然勾结浙籍首辅温体仁欲兴大狱,幸被明思宗阻止,才未给岌岌可危的政权造成更大危害。

五、结语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官方有意构建下,从明初至明中叶,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断丰满。官方的历史书写模式和文学作品快速传播,不断强化民众的历史记忆,导致民间历史记忆固化,在民众心中形成了刘伯温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预测未来的思维定式。提起明朝的开基创业历史,特别是对刘基的历史贡献的评价,民众一般都会认为刘伯温功不可没。刘伯温成为民众心目

中辅佐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最重要人物，其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甚至更胜一筹。

事实上，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谋士之一，因其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均与朱元璋的理念相悖，故刘基在世时，并未成为朱元璋的股肱重臣，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且具备一定的天文知识，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衬托人选。基于此，在明代官方的有意构建下，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受三国文化影响，又融入大量的三国文化元素。刘基故事几经层累、不断包装，愈传愈神，并借助文学作品传播。此类历史书写模式，虽然使刘基在明代迅速走上神坛，并被民众接受，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的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民众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

参考文献：

- [1] 田澍，吕杨. 近二十多年来大陆刘基研究综述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 (1): 146-150.
- [2] 陈学霖. 关于刘伯温传说的研究 [J]. 北京社会科学, 1998 (4): 44-48.
- [3] 杨讷. 刘基事迹考述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 [4] 竹下. 被神化的刘伯温 [J]. 文史天地, 2007 (12): 26-30.
- [5] 陈学霖. 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6] 王赫. 打破刘伯温事迹的神话 [N]. 中华读书报, 2018-03-21 (10).
- [7] 司马迁. 史记: 卷八 [M]. 裴骃, 集解. 司马贞, 索引. 张守节, 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41.
- [8] 萧子显. 南齐书: 卷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43.
- [9] 魏收. 魏书: 卷七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35.
- [10] 李百药. 神武纪 [M] // 李百药. 北齐书: 卷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
- [11] 刘昫, 等. 旧唐书: 卷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1.
- [12] 脱脱, 等. 宋史: 卷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
- [13] 脱脱, 等. 辽史: 卷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
- [14] 宋濂, 等. 元史: 卷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
- [15] 张廷玉, 等. 明史: 卷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
- [16] 柯劭忞. 新元史: 卷一 [M]. 张京华, 黄曙辉, 总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
- [17] 赵尔巽, 等. 清史稿: 卷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83.
- [18] 司马迁. 史记: 卷五十五 [M]. 裴骃, 集解. 司马贞, 索引. 张守节, 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9] 刘基. 诚意伯文集: 卷二十 [M]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25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20] 洪武八年四月丁巳 [M] //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 卷九十九.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 [21] 都穆. 都公谈纂: 卷上 [M] // 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 子部·小说家类: 第126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644.
- [22] 何乔远. 名山藏: 卷五十七 [M]. 张德信, 商传, 王熹, 点校.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1488.
- [23] 焦竑. 玉堂丛语: 卷八 [M]. 顾思,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60.
- [24] 司马迁. 史记: 卷九十二 [M]. 裴骃, 集解. 司马贞, 索引. 张守节, 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621.
- [25] 周先慎. 明清小说 [M].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9.
- [26] 罗贯中. 三国演义: 上 [M]. 4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 [27] 周群. 刘基评传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356.
- [28]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 卷一〇二 [M]. 钱曾, 笺注. 钱仲联, 标校. 2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29] 郎瑛. 刘徐纪错 [M] // 郎瑛. 七修类稿: 卷二十八.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30]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壬寅 [M] //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 卷七.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89.

- [31]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癸亥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十一.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39.
- [32] 刘辰. 国初事迹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33] 宋濂. 故江南等处行省都事追封丹阳县男孙君墓铭 [M] //宋濂. 宋濂全集:卷六十七. 黄灵庚,编辑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573.
- [34] 王树民. 廿二史札记校证:下 [M]. 订补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5] 宋濂. 故诗人徐方舟墓铭 [M] //宋濂. 宋濂全集:卷六十五. 黄灵庚,编辑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537.
- [36] 至正二十年三月戊子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93.
- [37] 至正二十三年五月癸酉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53.
- [38] 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庚寅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九.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18.
- [39] 张廷玉,等. 明史:卷一百五十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166.
- [40] 梁亿. 遵闻录 [M] //邓士龙. 国朝典故:中册. 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419-1420.
- [41] 郎瑛. 周张二仙 [M] //郎瑛. 七修类稿:卷九.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90.
- [42] 郎瑛. 陈友谅始末略 [M] //郎瑛. 七修类稿:卷八.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85.
- [43] 至正二十三年七月丙辰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58.
- [44] 至正二十三年八月丁酉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 [45] 吴元年九月丁酉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 [46] 洪武元年三月乙酉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 [47]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庚戌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295.
- [48] 陈建.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三 [M] //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第35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1.
- [49] 吴元年十一月乙未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416.
- [50]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610-611.
- [51] 李默. 孤树哀谈:卷二//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7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52] 查继佐. 罪惟录 [M] //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第32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04.
- [53] 张廷玉,等. 明史:卷一百六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528.
- [54]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己未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 [55]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 [56] 洪武元年正月庚辰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 [57] 洪武元年正月辛巳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 [58]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496.
- [59] 许重熙. 嘉靖以来注略:卷二 [M]. 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
- [60] 俞本. 纪事录笺证 [M]. 李新峰,笺证. 北京:中华书局,2015:164.
- [61]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040.
- [62] 嘉靖七年三月壬子 [M] //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2972.
- [63] 嘉靖十六年三月癸巳 [M] //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 [64] 洪武三年十一月乙卯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八.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144.
- [65] 祝允明. 野记一 [M] //邓士龙. 国朝典故:上册. 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01.
- [66] 廖道南,黄佐. 殿阁词林记:卷六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24.
- [67] 司马迁. 史记:卷十八 [M]. 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引. 张守节,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1959:297.
- [68] 吴元年十月丙午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384-385.
- [69] 洪武十年九月丙辰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十五.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885-1886.
- [70] 洪武十五年七月己巳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六.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2992.
- [71] 洪武二十年五月丙寅 [M]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2741.

- [72] 张廷玉，等.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3] 陈建.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二十五 [M] // 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第35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27.
- [74] 郑汝璧. 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一 [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75] 嘉靖十年闰六月乙丑 [M] // 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3022.
- [76] 张廷玉，等. 明史：卷一百〇五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050.
- [77] 郑晓. 今言：卷一 [M]. 李致忠，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48.
- [78] 郭勋. 英烈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3：236.
- [79] 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三十一 [M]. 影印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80] 李邦华. 文水李忠肃先生集：卷一 [M] //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2.
- [81] 东邨八十一老人. 明季甲乙汇编：卷二 [M] //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3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Deifying Liu Bowe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Liu Ji's Image

Lyu Yang

Abstract: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Liu Ji, who helped Zhu Yuanzhang to establish the Ming Dynasty, is portrayed as a brilliant and omniscient figure. His talents rival those of Zhang Liang and Zhuge Liang. In fact, Liu Ji was merely one of Zhu Yuanzhang's many aides and counsellors during the latter's rise to power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he experienced an unsuccessful official career. After his death, Liu Ji became the ideal figure for historians to enhance Zhu Yuanzhang's image, as he was the only founding Earl who had not suffered political liquidation and possessed astronomical knowledge. Consequently, historians in the Ming Dynasty deliberately modeled Liu Ji's biographies after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Liu Hou Fami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y also incorporated numerous cultural element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Although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writing mode rapidly deified Liu Ji and gained popular acceptance, it led to serious distortion of Liu Ji's historical narratives. Especiall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official history and folklores, often influenced by Zhejiang-native officials, perpetuated the official image of Liu Bowen through novels, storybooks, dramas and other literary forms. Thi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Liu Ji's historical status, but the true historical deeds of Liu Ji, the literary figure from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had already lost their original appearance. Today, the public only knows the fabricated image of Liu Bowen, not the real historical figure Liu Ji.

Keywords: Liu Ji; Zhu Yuanzhang;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Zhejiang-native officials

(收稿日期：2023-09-29；责任编辑：陈鸿)